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普希金学术史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Пушкина

张铁夫 著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普希金学术史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Пушкина

张铁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学术史研究 / 张铁夫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1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498-0

I. ①普… II. ①张… III. ①普希金,
A. S. (1799 ~ 1837)—人物研究 ②普希金,
A. S. (1799 ~ 1837)—文学研究 IV. ①K835.125.6
②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5025 号

书 名 普希金学术史研究
作 者 张铁夫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插 页 4
字 数 308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98-0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多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勢,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国外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绪言

从普希金生前起,普希金及其创作就得到不少俄国作家、学者的关注和评论。约两个世纪以来,普希金研究逐渐演变成一个专门的学科——普希金学(пушкинизм 或 пушкиноведение),在俄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普希金学形成的时间,俄国学术界说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应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因为“对于普希金学史来说,这几年是对普希金的创作遗产进行认真的历史—文学研究和版本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收集、研究和出版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和文献的开端。这个时期的基础是由 П. В. 安年科夫、П. И. 巴尔捷涅夫和 Я. К. 格罗特的活动奠定的。”^①我们知道,1855 年 1 月,安年科夫出版了《普希金传记资料》,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普希金学家。我国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表示了认同。例如《俄国文学批评史》第八章写道:“安年科夫首次编辑了一部普希金七卷集,发表了《亚·谢·普希金传记材料》(1855)及其他论普希金的著作,从而奠定了俄国普希金学的基础,对后代研究诗人有重要价值。”^②又如《普希金评论集》在安年科夫的《普希金评传》(摘录)的题解中说:“安年科夫是俄国文学评论家,也是普希金作品的出版者和第一位普希金学家。”^③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普希金逝世之后。著名俄国普希金学家 М. 齐亚夫洛夫斯基写道:“从 1837 年 2 月茹科夫斯基开始评论

① 《普希金·研究总结与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6 年,第 50 页。

② 见刘宁主编《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 242 页。

③ 见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年,第 341 页。

普希金的手稿,《同时代人》第10卷(1838)上发表了普希金的另一位朋友普列特尼奥夫所写普希金的传略起,苏联普希金学就算开始了。”^①我们认为,俄国普希金学之滥觞可以追溯到普希金生前。从1818年起,普希金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一些文坛前辈和朋友在书信和文章中对他多有褒扬。1820年,《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出版,使他第一次成为文学论战的对象。应该说,这就是普希金学的发端。

普希金学是研究普希金生平、思想和创作的科学,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M. 齐亚夫洛夫斯基认为:“普希金学在我国已经逾越了书房、档案馆和科学图书馆的门坎,进入了大众讲堂……”^②这就是说,普希金学不仅指对普希金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学术研究,而且指“在最广大的读者中宣传普希金的作品”^③。在这方面,他提到了原苏联科学院的三个集体项目——《普希金全集》、《普希金语言词典》和《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年谱》。而原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П. 帕利耶夫斯基在一篇题为《普希金科学院》(中译文为《关于普希金的对话》)的文章中,对普希金学的内容作了更广泛、更丰富的阐释。他在援引德·德·勃拉戈伊关于“普希金学已成为全民的事业”的观点后说:“普希金属于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就普希金发表自己的看法。……从事普希金学的人,实际上是在从事一项提高自己修养,规范自己行为的工作。……任何一个俄罗斯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每一个生活在俄语区、接触到普希金作品的人,都要经历这个高级学校,以提高自己的智慧,校正心灵的音律,把握生活的航向。”^④这就是说,普希金学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研究”,它不仅是对普希金本体的研究,而且也是研究者和读者提升自身人文素质、陶冶自己人格的途径。

当然,“大规模的群众性研究”并不包括违背科学原则的标新立异

①②③ M. 齐亚夫洛夫斯基:《苏联普希金学》,《俄苏文学》1989年第4期。

④ 《关于普希金的对话》,孙立杰译,《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9期。

和故弄玄虚。对 П. 帕利耶夫斯基进行采访的《文学报》文学理论部主任 C. 谢利瓦诺娃在对话的开头就说:“普希金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怪事儿。各种各样的探索都有——历史学的、考古学的、传记学的、医学的、小说学的(这类东西最多)等等。”^①她担忧这样下去,会有“淹没普希金的危险”。

诚然,谢利瓦诺娃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例如在苏联解体前夕,某些俄罗斯研究者把《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序诗就弄得非常神秘。《论据与事实》报 1991 年第 47 期(11 月出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普希金——俄罗斯的预言家》的短文,该文谈到,塔甘罗格的《瞬间》报发表了普希金的一个“哲学表”,称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数学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从 1292 年到 1920 年,世界文明的策源地将是欧洲各民族,从 1920 年起,俄罗斯及其归附的各民族将走在前面,东斯拉夫人的主导作用将持续到 2548 年,从 1993 年 10 月 18 日到 1998 年 9 月 14 日将是他们最活跃的时期,1998 年美国人对国际生活不会具有实际的影响。普希金把科学著作的思想“译成了”文艺作品,复制了自己的档案——“金链”,他为《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写了一篇序诗,它实际上是伟大诗人的遗嘱,每个字都有寓意。例如,33 个勇士就是人类在新时代将要经受的 33 次革命(按照普希金的意见,每 78.5 年发生过和将发生一次革命)。橡树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海湾边上”(塔甘罗格)的一个智囊。据说,普希金的“哲学表”是根据诗人交给自己的朋友——1829 年顿河部队派任长官 Д. 库捷伊尼科夫的一份档案整理的,目前档案保存在 Д. 库捷伊尼科夫的后裔 И. 雷勃金手中。雷勃金认为,普希金的宇宙模式不仅不亚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模式,而且超过了它们。而《普希金——俄罗斯的预言家》一文的作者宣称,“哲学表”的发表将轰动世界。十几年过去了,这件事在俄罗斯和世界上并未引起任何轰动。^②

① 《关于普希金的对话》,孙立杰译,《外国文学动态》1987 年第 9 期。

② 张铁夫等:《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5—96 页。

上面提到的这种“破译密码符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正如谢利瓦诺娃所说:“把普希金的每个词都视为某种密码符号——这表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普希金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旋律——质朴。普希金指望的是理解。他为我们每个人,而不是经过挑选和‘献身’于他的人而写作。不是破译密码符号,而是真正深入其思想深处——这就是每个普希金研究者的任务。”^①

二、它是俄国文艺学的组成部分,是同文艺学一起成长起来的。俄国最早的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特点的见解见于12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所谓“按照当代的实事”和“按照鲍扬的构思”的艺术手法就涉及文学理论问题。从13世纪上半叶鞑靼人入侵到18世纪初是俄国文艺学的“空白”时期;18—19世纪之交,俄国文艺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即用诗歌的“美学”理论代替了“修辞学”理论;到19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俄国文艺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后终于形成。^②

在俄国文艺学形成的过程中,作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普希金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对文艺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诸如文艺的社会功能、作家的责任、文学的人民性、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人民口头创作、语言和风格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廓清了浪漫主义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浪漫主义理论;正确地阐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社会职责,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理论。^③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创作也多所论述,并同他的论敌进行过多次文学性和非文学性论战。这无疑都是俄国普希金学的重要内容。

别林斯基是俄国文艺学中现实主义原则的奠基人,开创了俄国文

① 《关于普希金的对话》,孙立杰译,《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9期。

② 详见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第1章和第2章,刘保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③ 详见张铁夫等《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修订本)第10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艺学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他的普希金研究分不开的。19世纪40年代,他曾以《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为总标题,发表了十一篇关于普希金创作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普希金的各类题材作品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论,而且阐述了“现实性”、“民族性”、“人民性”等许多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促进了俄国文艺学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普希金评论也是同他们的整个文学批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评论家们的文学史思想,是以深刻地分析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俄国文学和50—60年代的文学为依据的,并用有关现实美和艺术美、世界观的作用、现实主义典型化等科学的美学理论见解,用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艺术性的准则充实起来。”^①

从那时起,无论是文艺学中的学院派(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文艺学派、心理学派)、象征派、形式主义学派、符号学派,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学派,无不把普希金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内容。普希金学与文艺学可说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并肩前进。无怪乎著名文艺理论家Д. 利哈乔夫说:“在我看来,普希金学的水平是祖国文学科学发展的试金石。”^②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把俄国的普希金学分为普希金生前、19世纪40—60年代、19世纪后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白银时代)、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等六个时期,实际上它们就是俄国普希金学发展的六个阶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俄国普希金学早已越出了本土的范围,在世界五大洲生根开花,形成了世界普希金学。因此,我们将用一定的篇幅对世界普希金学作必要的介绍。

由于普希金学包罗万象,涉及面太广,本书不可能一一阐述,而只能对普希金学术研究的历史作一梳理和评述。因此,本书各章标题的关

① 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页。

② 见《光辉的名字普希金》,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88年,第6页。

关键词为“普希金研究”，而非“普希金学”，这是需要说明的。

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由宋德发同志执笔，他还参与了第七章第五节的写作，特此致谢。